



红色寻踪

仰望西柏坡

钟芳

记的中央工委先期进驻西柏坡。1948年5月26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与中央工委合并。至此，这个小山村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中央所在地，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在这里，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组织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的蓝图。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历史征程。

静静走进每一个展厅，一件件珍贵的文物、一幅幅感人的照片，都蕴含着一段红色革命历史故事，见证着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最令人震撼的是馆内一幅浓墨重彩的三大战役巨型油画，鲜活的人物、生动的场景，形象逼真地再现了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以及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善战。

在中共中央旧址，我们先后瞻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旧居，参观了中央军委作战室和七届二中全会会址。旧居都是一间间普通的北方土坯房，室内十分简陋、条件极为艰苦。毛泽东旧居前院有一个石磨，三大战役期间，毛泽东与朱德、刘少奇等领导同志经常围坐在磨盘边，研究时局、讨论战事，因此西柏坡留下了“磨盘上布下雄兵百万”的佳话。当年的中央军委作战室，面积不足70平方米，三张桌子，两张地图，一部电话，正是在这里，也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共中央运筹帷幄，部署和指挥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一道道战斗命令从这里发出，一份份胜利捷报从各地传来。

旧址院落里最大的房子是七届二

信仰

尹文阁

当无数的身姿
化作一座座冰冷的石碑
你使用忠诚
铸就了信仰

你是南昌城下
那盏旧式马灯，将黑夜洞穿
你是井冈山血染的翠竹
赤化了工农

你是湘江上的人桥
裹枪林弹雨，悲壮了河山
你是延安窑洞里那一角红五星
照亮了信仰之光

你是长白山
耸立的满腹树皮的铮铮铁汉
你是舍身炸碉堡的战士
最后的呐喊——

你用悲壮
收拢了过往弥漫的硝烟
你用信仰
托起了共和国蓬勃的春天

这里翠竹青青
这里生命青青
多少春天由此发芽
翻开了这片红色的土地

井冈山的高度已是历史的高度
朱毛会师，把一座大山
烧成一把火炬
嘹亮的军号震响了灰蒙蒙的天空
我们只有草鞋
但决定征服更长的路

走进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林杰荣

安静的红军南路，正适合
安静地讲述一个红色故事
只有足够安静，才能
倾听到历史震撼人心的回声

八角楼灯光温馨

红旗下全是最淳朴的军民情
一根灯芯照亮一场革命
太阳，从井冈山悄悄升起

黄洋界的风吹散硝烟
捍卫，是血肉铸就的誓言

致父亲

胡巨勇

守一份清贫
一生的悲喜欢欣播进土里
沉默的父亲
用抚摸农事的姿势
解读岁月
青禾的拔节声
把泥土的肌肤照亮
父亲深情如网的目光
是我一生的口粮

用握紧锄把的手
打磨语音
一生的言行总与
芒种和镰刀有关
脚步穿过季节的农谚
父亲把沉默的情感
注入我发达的根系
摘一路预言上路
父亲句句叮咛
牵引我流浪的脚步

多少次，午夜梦回
站台上父亲的手
如炊烟般举起
苦对异乡岁月 注定
父亲瘦弱的身板
让我的情感
有山一样的依靠

演节目

我自幼内向腼腆，怯于抛头露面。回忆过去，童年时的那一次登台表演节目，可说是我一生仅有的一次当众“亮相”。

1964年，我上小学二年级，班里为“六一”准备节目，马老师点名让我们四个同学排练，我心里那个怕呀、羞呀，简直想找个地缝藏起来。而且，四个同学里还有两个女生，表演中还有拉手动作，实在让我们难堪。因为我们的不合作，老师无奈，只好换成四个男生，我记得是王彪、冯毅、朱卫国和我，节目叫《社员都是向阳花》。老师给我们每人做了一块向日葵画板，又让每人自带一条白毛巾，或围在脖子上或扎在头上，像陕北农民那般，手持着向日葵表演，倒也小社员模样。

六一儿童节一大早，同学们都上白下蓝装束，兜里揣上些大豆、瓜子、水果糖之类的“好吃的”，欢天喜地早早地来到学校参加庆祝活动。学校里彩旗飘扬，“庆祝六一儿童节大会”的会标高悬会场正中，鲜艳夺目。平时以“男子汉”

自居的我们，被描上了弯眉，涂上了粉腮和红唇，一时间臊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看看人家上台的那些同学，似乎都不在乎这些，表演也自然到位。于是，我们也顾不上害羞害怕了，只盼望早点儿上台表演……

我们的表演成功了，全校的师生报以热烈的掌声。马老师赞许地望着我们，大家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中。这时候，那些怕羞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了，我们四个互相瞅一眼，嗨！真是一个赛一个俊气。

我的第一任老师给了我一次登台演出的机会，让我一生难以忘怀。那首《社员都是向阳花》的歌儿，至今还经常萦绕在心头。

自制玩具

对门的邻居粉刷房子，清理出不少废物要扔掉，其中有小孩子的电动汽车、变形金剛、滑板等。有人问女主人要不要扔掉？对方反问：坏了不扔，留着有什么用？听了这话，不由得为那些玩具惋惜。

我们小时候因为家庭经济拮据，买

不起玩具，所以自制玩具就成了孩子们乐此不疲的事情。最深刻的记忆，莫过于做乐器小镲了。我家附近开着一家浴池，院里散落着一些圆铁片，我和伙伴们捡回来，找出家里的小榔头，把铁片平放在滴檐石的凹坑上，一锤锤砸下去，铁片的中间部分就被砸成了锅底形，在锅底的正中央用铁钉子凿个孔，箍上一根小红布条，一只镲就做好了。选两只大小相当的一配，小镲就做成功了。两只镲一碰发出“锵锵锵”的响声，十分好听，它在我们玩的游戏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那时的孩子一般都会自制简单的玩具，尤其是一些群体的游戏，聚散不定，没有一点制作的本事，根本没有办法参与。比如抽冻牛，大伙儿都去冰面上抽，比赛谁的冻牛转得稳、转

撷趣斋旧事三则

张炯

得时间长，如果你的冻牛高矮和宽度比例失调，转动起来就会摇头晃脑，即使你用鞭子不停地猛抽，冻牛也坚持不了多久。在冰天雪地里划冰车，也颇有吸引力，那种欢乐无以形容，可与溜冰、滑雪相媲美，即便是大人们也乐此不疲。而制作冰车的关键在于车下轨道的角度，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大了爬坡过沟虽然顺利，但在平地上容易翻车；角度小，前进时比较稳当，但不利于过沟上坡。

我怀念那些自制玩具的童年时光。

滚元宵

四十多年前，我插队返城，就业于市饮食公司，经历了一段难忘的时光。那时候，每年春节甫过，各饭店、糕点铺即忙得不亦乐乎，准备元宵供应市民过节。其时店内生意正

淡，最宜组织人手制作元宵。先将提前购入的芝麻，找磨房磨成面粉备用。再将芝麻、桃仁、瓜仁、果脯、青红丝、白糖等，从库房过磅筛出来，上大案切成碎屑，混合均匀，装入条盘之中按压结实，再一条一条盘起来，上面压上重物。经过至少24小时以后，取下条盘翻扣于大案，磕出压好的果料，切成两厘米见方的小块，元宵馅就算做好了。

腾清大案，将大筐箩置于案上，先放入四五斤江米粉，再用箬篱盛出两三分元宵馅料，浸一下水，稍稍一下水后倒入筐箩中，元宵的制作就正式开始了。只见大案两边头戴白帽、口罩，身穿白色工作服的员工，双手把握着筐箩，前一下后一下迅速地摇动起来，一会儿，方方的馅料不见了，只有雪白的小圆球在筐箩里挤来撞去，拼命往身上粘着江米粉……元宵球逐渐滚大后，表面变干，筐箩里的江米粉也变少了，用箬篱盛起元宵球去水里浸一下，再往筐箩里加入一些江米粉，将沥过水的元宵球倒入接着滚。如此数次，滚成直径4厘米大

小的元宵，过秤，一斤大约二十二三个即为成品。到了正月十二三，店堂的柜台前顾客不绝，争相购买。全店员工人人上阵，开足马力生产，五十多号职工通宵达旦制作，战至翌日清晨，面尽馅光，方停下手里。那时，全店90%是年轻人，不识字为何物，到点照常开张，门板一摘，顾客蜂拥而入，一天的销售又开始了。

到了正月十四、十五这两天，滚元宵、卖元宵进入了白热化状态，制售两旺，节日气氛浓烈得化都化不开。店外是“玉漏银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明开。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店内是“元宵白如雪，工人汗似雨。一宵歌谣落，团子味知否”，滚出来的元宵盛满了十多个大筐箩，大家才停下来稍作歇息。

当时的消费量，不能与今日同日而语，但生产厂家少，注定了“滚”元宵者之累。一想到当年的真诚和付出，心头不由得坦坦然、热乎乎。小小的元宵，牵系着多少人的真情，寄托了多少团圆的心愿。正月十五滚元宵，是多少挥之不去的记忆！

那年那月那日

赵一生

那年，我十八岁；那月，我正忙着填报高考志愿；那日，多日不见的父亲突然来到学校。

“爹，您咋跑来了？”我的心咯噔响了一下。

“爹，不用不用，我没啥事儿。”我就说就下意识抓了抓本来并不痒痒的耳朵。

“爹，不用不用，我没啥事儿。”我就说就想来眊眊你。”爹就抽烟就揪了揪我厚厚的耳垂。

“爹，真的不用，我在学校吃得也好，睡得也好，啥也挺好！”我就说就不自觉地挠了挠本来并不发痒的头皮。

“二子，看你说的，学校那饭寡汤淡水的，爹又不是没见过。咱爷俩今儿出去改善改善。正好自由市场有家饭店，那老板爹认得。”爹就抽烟就用手摸了摸我的脑袋。

“爹，算了，算了，我在食堂已经吃过了。”我左手搓了搓右手尽量推托着。

“二子，爹跟你说话呢，甭心疼钱，爹有的是。”爹就说就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张崭新的“大团结”，神气地在我眼前抖了抖。

实在拗不过爹，只好上了爹的自行车后座。从学校到自由市场是个大上坡，爹呼哧呼哧地骑着，腰弯得就像张弓，但爹骑得很快，好几次差点儿把我从后面闪下去。

“到了！到了！二子，到了。”爹一手擦着满头大汗，一手指着路边一家连招牌也没有的小饭店说。

饭店门面很小，但看起来还算干净。

“兄弟，给我们爷俩来盘鱼香肉丝，来两碗米饭！”爹擦抹着额头上沁出的汗珠子直奔后厨。

不一会儿，饭菜上来了，但米饭只有一碗。爹使了个眼色，老板把饭菜直接端到了我面前，瓮了瓮肩，眨了眨眼，满是歉意地说：“小侄儿，真不好意思，今儿饭店人多，米饭就剩这点儿了，你先吃，等会儿大米焖好了，再给我们老哥端。”老板就咕嘟咕嘟地嚼着大豆就转身回了后厨。

“二子，你先吃，给爹放开裤带吃，吃完赶紧上课去。”爹就督促我吃饭就又揪了揪我厚厚的耳垂。

我真想客套几句，但那鱼香肉丝实在太诱人了。一小绺一小绺的肉丝，红茹茹的，油亮亮的，其间夹杂着少许白是白绿是绿的葱花和姜片儿。望着香气四溢的美味，我边咽着口水边拿起筷子，低头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没二分钟，一小盘鱼香肉丝一大碗米饭被我吃了个精光。

“二子，吃饱了吗？香不香？香不香？”爹眯着笑眼，歪侧着头，一边抽烟一边看着我吃饭。

“爹，吃饱了，吃饱了，饭真香，往死香。”我用手绢儿擦了擦油乎乎的嘴唇，只觉得那是有生以来吃得最香最香的一顿饭。

“爹，一会儿您儿也吃哇！”看着爹干灰干的嘴唇，我颇有些过意不去。

“二子，看你说的，咱父子俩还分啥你我。饭也吃了，水也喝了，你赶紧回学校给爹上课去哇，爹一会儿吃完饭就回村眊你妈去了。”爹站起身来，把一个烟头扔到地上用脚踩了踩，就踩又摸了摸了我的脑袋。

“行，爹，那您儿一会儿回村路上慢点儿。”我边擦着头上的汗珠子边心满意足地离开了那家连招牌也没有的小饭店。

世事无常，没想到只过了一个星期就出事了。由于多年没明没夜地干活儿，经常抽烟喝酒，再加上拖家带口营养不良，爹昏倒在矿上值班室，等路来路过的人发现时，爹已瞳孔放大，没有了呼吸。

那年，爹四十七岁，我十八岁；那月，我们孤儿寡母打发发了爹，把爹埋在了村北北河湾；那日，高考结束了，我漫无目的又来到了自由市场那家连招牌也没有的小饭店。

“我说那孩子，我压根儿就不认识你爹，那天你前脚一出门，你爹后脚结完账就走了人。当时你爹让我哄你说他没来饭了，因为他不舍得再掏钱，说是省下来好给你攒学费上大学。”老板边说边咧嘴地笑着。

“这，这，这……”我头皮一麻，头发蠕蠕地立了起来。

“你爹还说，你是他三个儿子中最看好的一个，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老板就咕嘟咕嘟地嚼着大豆就神经兮兮地问道。

“爹，爹，爹……”我两眼一酸，泪水哗哗地流了下来。

好想听到真话

马海

和文友相聚时，我不止一次地，听他们说我是性情中人。对于这个略带赞许的词语，我常常欣然接受。因为，我心里清楚，我是个喜欢说真话的人，也敢于向他人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抑或看法。

可是，对于“性情中人”这句评语，我至今持半信半疑的态度，尽管我说了真话，可我却却在疑惑：一些朋友给予我这句评语，到底是不是真话？是不是发自内心的表达？因为，很多时候，这句评语是对别人的一种另一类的既不过头也不有失自身身份的“中性恭维”。

现如今，勇于表达自己对某件事或某个人的真实想法或看法的，为数不多了。大多时候，人们都在说一些无关紧要或者不痛不痒的话。但凡触及需要说真话的敏感话题时，许多人选择的是沉默不语或是岔开话题。

正是因为难以听到真话，所以敢于说真话的人令人敬佩。如文学家鲁迅，便敢于直言国人身上的惰性或劣性。他的文章中闪烁的人性光辉，至今仍警醒着国人，也警醒着世人。

真话，不仅仅是善意地提醒对方，更多的意义在于，纠正错误，认识不足，从而改正或完善。如此说来，真话，小而而言之，对个人有益；大而而言之，于国家有益，于社会有益。

真话，有如荆棘，带着刺儿，却能让你一下子打个“激灵”；真话，又如苦药，含着辛辣，却能使你一下子“醒悟”。

好想听到真话。我想，这不单单是我个人的愿望，也是和我同样有着不愿将错误进行到底的或者想把某件事情做得更好、更完美的人的愿望。

这才是我们好听到真话的原因所在。

与其大多时候说些无关紧要或者不痛不痒的话，倒不如多讲些真话。也省得把大把大把的时光浪费在那无谓的舌舌之上。

我平生最见不得那些嘴上一套、背后一套，不说真话的人。对于那些人的话，我多半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我喜欢的、敬重的，是那些说真话的人。因为，对你说真话的人，才真正地把你当作“哥们儿”看待。

尽管，早些年，我因为为单位常说真话，而不讨人喜欢；尽管这些年，我仍然在说真话，而在无意中损伤了某些朋友的自尊或者颜面，但我还是这个性格，也许也是与生而来的秉性。我还是一如既往地，总想把心里想的，一股脑儿地说出来。

真话难听，正因为难听，才愈显其可贵；真话难以听到，正因为难以听到，才愈显其意义之大、分量之重！